

# 从唐诗看中晚唐藩镇割据下的河北社会文化状况

马吉照,李国亮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100)

**摘要:**唐诗所反映出的河北地区与唐中央的交流、诗人往还河北及在河北的活动、围绕藩镇的诗歌创作活动内容等说明,藩镇割据使河北文化遭受重创,明显退步和一定程度的“胡化”是客观存在的,但唐后期河北社会文化的主体仍是处于退步、萧条期的汉文化,并且在与游牧民族文化的融合中逐渐实现着对游牧文化的同化,所谓唐后期“河北社会全然胡化”的论断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关键词:**藩镇;唐诗;中晚唐时期;河北社会文化;胡化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4)01-0066-07

隋代至唐前期,向为儒学发达区域的河北地区承曹魏、北齐余绪,在文化上达到鼎盛,表现为:从政治和社会影响力上,博陵、清河崔氏、范阳卢氏、渤海高氏等河北士族大家作为传统“礼法经术”的传承和代表者,是拥有重要的政治势力和社会影响的一极。学术方面,“到隋唐时代,北方学风分布的总趋势已经完全转移到了长安—洛阳—安阳—信都—河间这条主轴线上”<sup>[1]139</sup>。所谓“安阳(今河南安阳,与河北邯郸毗邻,唐时属河北道)—信都(今衡水冀州)—河间(今沧州河间)”一线,正是从河北南部延伸到中东部平原这一地域。文学方面,据梅新林对著名文学家籍贯地理分布所作统计,隋代和唐前期河北文学家数量分别居全国第1和第2位<sup>[2]48-53</sup>。

对这一文化鼎盛背景有着充分认识的陈寅恪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自唐玄宗时起河朔地区即为一“胡化”地域的“假说”,认为藩镇割据下的河朔地区“政治、军事、财政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当时大唐帝国版图以内实有截然不同之二分域”<sup>[3]19</sup>。自此,河朔胡化观成为唐史学界的经典之论,虽然后来学者有反对,也有细化和匡正,但人们至今惯用陈先生的观点来说明河朔地区的社会文化问题,河朔胡化观仍在学界占有主导地位。然而,讨论盛唐及安史之乱以后河北的胡化,之前数百年间这一地区文化的发达乃至鼎盛背景,是无论如何不应被绕过的。本文通过对有关河北唐诗的考察,从唐诗材料中所反映出的河北地区与唐中央的交流、诗人往还河北及在河北的活动、围绕藩镇的诗歌创作活动等方面入手,试图对中晚唐河北社会文化的真实状况得出自己的认识,为方家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一定价值的参考。

## 一、中晚唐文士在河朔与中央间的双向流动

应当注意到,虽然河北藩镇有与唐中央极其隔绝敌对之时期,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情况并不一

收稿日期:2013-11-05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河北省旅游文化产品‘走出去’营销战略研究”(201303294)

作者简介:马吉照(1977-),男,河北景县人,讲师,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隋唐五代文学、燕赵地域文化。

致,任何主观简单化的论断都不可能在唐后期长约一个半世纪时间广泛适用于河朔这一广大地域。文化上的交通和文士个人的流动,绝不是政治军事上的独立割据所能一概阻止。事实上,虽然今天不可能详尽考知所有藩帅对文士在本地与唐中央统治区间流动所持的态度,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双向交流在唐朝后期总体上非常普遍。

一方面,“两河诸侯竞引豪英,士之善利者多趋之,用为谋主”<sup>[4]4515</sup>,外地文士去往河北藩镇任职乃是普遍现象。著名诗人李益赴任幽州从事,并作“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楼”献刘济,以及韩愈送董邵南游河朔的例子人所共知,史籍或墓志中所载唐中后期到河北藩镇为官的内地上人则更多,此处仅举唐诗中两例,先看韩翃《送李湜下第归卫州便游河北》,韩翃为大历诗人,时代早于韩愈,但诗中主张与韩愈送董邵南之意毫无二致:

……屡道主人多爱士,何辞策马千馀里。高谭魏国访先生,修刺平原过内史。一举青云在早秋,恐君从此便淹留。有钱莫向河间用,载笔须来阙下游。

诗人刘沧为晚唐大中八年(854)进士,其《送友人罢举赴蓟门从事》是晚唐士人北走河朔之例:

人生行止在知己,远佐诸侯重所依。绿绶便当身是贵,青霄休怨志相违。晚云辽水疏残雨,寒角边城怨落晖。此去黄金台上客,相思应羡雁南归。

对此,陈寅恪先生也说“盖是当日社会之常态,而非变态”,并且“长安文化统治下之士人,若举进士不中,而欲致身功名之会者,舍北走河朔之外,则不易觅其他之途径也”。匪夷所思的是,寅恪先生专注于论两区域之差异,竟得出“然于此益见大唐帝国之后半期其中含有两独立敌视之团体,而此二团体之统治阶级,其种族文化亦宜有不同之点在也”的结论,大量文士北走河朔这一历史趋向,所证实的恰是在政治上存在“两独立敌视之团体”之时,种族文化方面具有一脉相传的相同点——明明是不同的政权统治,相同的文化血液。

还需注意的是,此时去往河北的官吏并非全是入戎幕,也有普通的地方官。河北藩镇自任官吏是其独立性的标志之一,作为整体情况虽确凿无疑,但以唐后期时间之久河朔地域之广,何时开始,施行范围,自亦不能全然一致。如钱起《送李九归河北》,李九为谁尚待考证,但从“文武资人望,谋猷简圣情。南州初卧鼓,东土复维城。寄重分符去,威仍出阊行。斗牛移八座,日月送双旌”等内容看,至少当为州刺史一级的地方大员。再如韩翃《送蓼县刘主簿楚》诗云“起家得事平原侯,晚出都门辞旧游”,蓼县在今河北景县,毗邻德州平原郡,唐永泰以前属之(故云“得事平原侯”),永泰后属冀州<sup>[5]1505</sup>,为成德镇李宝臣所辖,这位初登仕途的刘楚主簿显为朝廷所派。

另一方面,在河北的文士也没有断绝朝向唐中央的仕进之路。

首先,河北士人通过参加科举流向唐统治区的途径并未断绝。《唐摭言》卷一《会昌五年举格节文》,曾具体限定各节镇所送明经、进士人数,并未将河北诸镇排除在外:

其河东、陈许、汴、涂泗、易定、齐德、魏博、泽潞、幽、孟、灵夏、淄青、郛曹、兖海、镇冀、郾胜等道,所送进士不得过一十人,明经不得过十五人。

以上镇冀、幽州、易定三镇的全部,魏博镇的贝、魏二州,泽潞镇所属五州中位于太行山东的邢、洺、磁三州,齐德沧景节度治下的沧、景和德州局部均属河北。如果这些藩镇已经长年不送人应举,那这个限制选送人数的规定就没有必要将其考虑在内。河北诸镇名额数在该文所列诸镇名额中算较少的等级,这反映出在唐朝的文化地位下降,但每镇进士、明经共25人,每年所送贡士名额总计仍可达百人上下。既有相当数量的名额,自然会有远多于此数的读书人犹“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可知当时河北青年绝非都像“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的范阳卢霏<sup>①</sup>那个样子。中晚唐河北籍诗人中,如早年长期生活在家乡范阳后为长江主簿的著名诗人贾岛,婚后

<sup>①</sup>杜牧《樊川集》卷9《故范阳卢秀才墓志》。自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举其为例,卢霏几成唐后期河北青年隔绝文化的典型,在后世学者论说唐后期河北文化风气时被屡屡引用。

跑到长安漂泊十余年矢志考进士终于得中的魏州公乘亿,晚唐魏博判官、魏州人刘赞以及中唐幽州节度使刘济都曾“少举进士”,俱为例证。另再举唐诗中两例,钱起有《送安都秀才北还》:

年少工文客,言离却解颜。不嗟荆宝退,能喜彩衣还。

新月来前馆,高阳出故关。相思东北望,燕赵隔青山。

所送显然是一位由河北来赶考却铩羽而归的不第秀才,这是战后不久大历年间的情况。方干有《送李恬及第后还贝州》,是晚唐的一个考中进士又准备归还故乡的河北文士:

成名年少日,就业圣人书。擢桂谁相比,簷金已不如。

东城送归客,秋日待征车。若到清潭畔,儒风变里间。

再者,河北藩镇僚佐流向唐统治区朝廷会予以接纳,藩帅也并不一味加以反对和阻拦,有的也会代为举荐。“科举及第—服务方镇—入朝为官”的模式乃中晚唐文人一条重要的仕宦之途,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对此有详尽论述<sup>[6]</sup>,河北藩镇虽有独特性,但如果到河朔谋求出路等同背叛唐朝,入朝无望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士人选择北上。中晚唐著名诗人中在河北藩镇任职后又入朝为官的例子很多,如李益被刘济辟为幕府,后入朝,任秘书少监时还因当年献刘济诗降居散秩,但终未深究,俄又起用,做到右散骑常侍、礼部尚书的高位;再如杨巨源、王建皆曾入魏博幕,后来都由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向朝中举荐。有的则根本拒绝为藩镇效力,如刘言史得王武俊礼遇,却不肯为其宾佐,又拒其所授枣强令,后来到唐统治区任职,再如成德节度使贲五百金辟窦常为掌书记而窦常不就<sup>①</sup>。唐诗作品中同样也可得到例证,如杜牧《洛中送冀处士东游》:

处士有儒术,走可挟车辮。……四十馀年中,超超为浪游。元和五六岁,客于幽魏州。幽魏多壮士,意气相淹留。刘济愿跪履,田兴请建筹。处士拱两手,笑之但掉头。自此南走越,寻山入罗浮……

这位冀处士自由来去幽州、魏博二强藩,拒绝服务藩镇而终归唐土,藩帅也都并未与他为难。诗人诗作中尚如此,其他散见于史籍、碑志等的一般在朝廷与河北间流动的官员文士就更不胜枚举了<sup>②</sup>。

## 二、中晚唐诗人在河北的活动与创作

我们首先对中晚唐河北本土诗人情况加以考察。

据梅新林在《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一书中对唐前后期的文学家所作统计,河北文学家数量在唐前期列第2,唐后期列第3,仅后退一位;而在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一书所作分时段统计中,初唐、盛唐河北诗人数量在全国分列第2和第5,中唐、晚唐、五代分别列第5、第7、第5<sup>[7]</sup><sup>35</sup>。应当说,除初唐较突出,其他并无显著变化。可见,中晚唐河北仍是全国产生诗人较多的地域。笔者也曾以陈尚君《唐代诗人占籍考》<sup>[8]</sup><sup>138-170</sup>为基本依据,结合周祖撰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和其他相关论著和史料,对唐代河北本土诗人作过全面、细致的考察统计。数据显示,在唐代220位有诗存世至今的河北文士中,初唐为50人,盛唐31人,中唐69人,晚唐及五代71人,从数量上看,同唐诗创作到中晚唐更加普及、现存诗数量也更多的趋势相一致,河北中晚唐诗人比初盛唐有了大幅提升,河北唐诗在早期的基础上是继续发展的。

考虑到今天在统计唐人籍贯时,在缺乏其他更明确的材料时有些是采用郡望作为依据,而河北士族大家在唐前期向两京地区的迁徙较为普遍,故此部分诗人可能已不在河北活动,所以实际情况应比

①褚藏言《窦常传》:“贞元十四年秋,成德军节度使卢泚贲五百金辟为掌书记,不就。”(《全唐文》卷761)成德军并无卢泚其人,《旧唐书》本传亦载此事,聘窦常者为王武俊:“贞元十四年,镇州节度使王武俊闻其贤,遣人致聘,辟为掌书记,不就。”故知此为王武俊事,褚藏言误书为卢泚。

②需要指出的是中晚唐河北藩镇禁止士人移居外徙的情况也是有的,如《唐故冀州阜城县令兼□□□史赐绯鱼带襄阳郢州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志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大和049)载:“建中初,镇冀之间,自为一秦,颇禁衣冠不出境界,谓其弃我而欲归还。……府君至于身歿,不遂却反。”

数据显示萧条,但仍有部分诗人是有在河北行迹可寻的,情况当不至十分荒芜。陈寅恪先生所举范阳卢霏的例子,后来广为学者所征引,但举例子的论证方法,在逻辑上说服力实为有限,因为相反的例子,在中晚唐河北自可很容易举出许多。诗人中如范阳贾岛,元和七年(812)离故乡再赴长安之前,基本是在河北度过,今北京房山及河北景县、曲阳、唐县等地留有不少遗迹或传说。他早年为僧,可知还并非出自家境殷实、具有较好文化传统的士族大家,但在其入唐结识韩愈、张籍等著名诗人时,显然已具有相当的诗歌修养和文化造诣,而从其诗歌中可见,他在河北时周围经常过往唱酬的风雅之士也不乏其人,如文朋诗友经常相约拜访的郝逸人(《易州过郝逸人居》:“每逢词翰客,邀我共寻君”)、“诗负属景同,琴孤坐堂听”的山中王参(《答王参》)、一同雪中对弈、饮酒听风的博陵故人(《怀博陵故人》:“雪压围棋石,风吹饮酒楼”)等等。

如果说诗人占籍的研究是相对较为静态、滞后的反映,那么对中晚唐诗人在河北的活动与创作及送人往还于河北的诗歌加以关注,当为我们了解当时河北社会文化的真实状况提供更为有价值的参考。翻检《全唐诗》,可以追寻到在河北行迹的中晚唐诗人在50人以上,著名的有独孤及、元结、孟云卿、于鹄、刘言史、韩愈、白居易、崔玄亮、窦巩、李益、张籍、王建、杨巨源、贾岛、姚合、马戴、雍陶、韦庄、温庭筠、聂夷中、杜荀鹤、张祜、张蠙、贯休、刘沧、罗隐、罗弘信等。毋庸讳言,唐后期来到河北的诗人多为短期的游历、出使或求职入幕,像初盛唐的许多著名文臣到河北任地方大员(如张说曾任相州刺史、幽州都督、河北节度使,张九龄任冀州刺史,狄仁杰任魏州刺史、幽州都督,宋璟任魏州刺史、冀州刺史)的现象没有了,这是河北藩镇世代拥兵自立、自属官爵导致的客观结果,从而也大大限制了著名文士的到来对本地文化的提升效应。但尽管如此,众多诗人文士的不断到来和活动,使我们不得不对过于强调这一区域“胡化”程度的论断表示怀疑。

安史之乱刚刚平定的大历年间,河北地区“城池百战后,耆旧几家残”(刘长卿《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虽有李嘉祐、李端、郎士元、崔峒、司空曙等河北籍诗人活跃在南方或京城,成为当时诗坛的中坚,河北本土确实显得萧条、沉寂。不过,从整个唐后期来看,不同地域不同时期情况不尽相同,总体而言,虽然藩镇间时有战乱杀伐,但诗人活动却并不鲜见。以大历之后、“元和中兴”之前的德宗建中、贞元年间为例,情况已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荒芜。在北部的幽州地区,建中二年(781),范阳县丞吉逾与其侄吉播、吉駒、吉駟及幽州卢龙节度都巡使王潜、处士轩辕伟等人游房山云居寺题咏唱和<sup>[9]160</sup>。贞元中,李益、王建等著名诗人先后入幽州幕,张籍亦曾前往游历。著名诗人贾岛此时亦活动于家乡范阳及周边易、定等州。中部的成德藩镇,节度使王武俊虽为武夫,但特重文士,“开幕辟士,无非才俊”<sup>[10]100</sup>。贞元中,诗人刘言史曾在其幕下活动多年,与其相处甚欢。贞元十四年(798),窦常游河北,王武俊又欲以五百金聘之。南部的魏博藩镇及泽潞藩镇的太行山东三州,汉文化的特征就更为典型。约在建中四年(783)至贞元九年(793)十年间,中唐“新乐府运动”的两大主将张籍、王建“鹄山漳水每追随”,在河北南部今邯郸、邢台一带,度过了他们人生中关键的读书求学的青年时代,并且在此期间与元结、于鹄等诗人结交<sup>[11-12]</sup>。王建《送于丹移家洛州》赠一位“诗礼不外学,兄弟相攻研”的知名文士,诗中描述对方将要迁往的洛州说:“耕者求沃土,沤者求深源。彼邦君子居,一日可徂迁”,将洛州视为适合饱学之士居住的沃土深源。贞元四年(788),昭义节度使(驻潞州,所辖邢、洛、磁三州在今河北)李抱真表荐贝州清阳(今河北清河东)人宋庭芬之女宋若昭五姊妹入宫。宋氏世为儒学,五女俱有文名,王建有《宋氏五女》、窦常有《过宋氏五女旧居》俱深为推崇。贞元二十年(804)冬,大诗人白居易有河北之行,作有《除夜宿洛州》、《邯郸冬至夜思家》、《冬至夜怀湘灵》等诗。

### 三、围绕河朔藩镇的诗人活动与创作

有学者认为河北地区在安史之乱后便达到了全是胡化的高潮,此后又开始逐步汉化,应该说唐诗材料是可以为这一观点提供支持的。上文已指出,安史之乱刚刚平定后的大历年间河北诗坛一片沉

寂,而建中、贞元年间已大为改观,诗人在河北的活动已经比较活跃。事实上,接下来的“元和中兴”可以视作中晚唐河朔地区一次汉化的高潮。

为元和削藩乃至中兴开启大门的,正是魏博藩镇田弘正的归顺朝廷。这是唐中后期朝廷与藩镇关系的一个关键性事件,对元和文人重新高扬的精神风貌是有影响的。田弘正身为野蛮跋扈的安史降将之后,自己却是一个受汉文化熏陶的典型。其父田廷玠“儒雅忠义……曾任魏博节度副使,劝田悦勿反,未果郁郁而终”。田弘正更是“乐闻前代忠孝立功之事,于府舍起书楼,聚书万余卷,视事之隙,与宾佐讲论古今言行可否”<sup>[5]3850</sup>。著名诗人王建、姚合、杨巨源以及“性灵且奇才甚清”的杨巨源从弟杨茂卿都曾在其宾佐之列,魏博幕府人才之盛当世知名,诗人张祐有“节旌穷海岛,诗句起河梁。幕府推贤佐,杯盘任客狂”(《投魏博田司空二十韵》)写其盛况,李端之子李虞仲离魏州时,杨巨源相送的诗中亦说“邺中多上才,耿耿丹青姿”(《送李虞仲秀才归东都,因寄元李二友》)。

稍早于田弘正归朝,贞元元年(785)至元和五年(810),刘济镇幽州,这位曾经中过进士的藩帅无疑具有更为典型的汉文化背景,正是他任节度使期间,张籍、李益、王建、杨巨源这些重量级诗人的先后漫游或入幕幽州,使得幽州藩镇和唐诗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关联。应当注意到,幽州藩镇治下的河北北部,此前长期是中原士人观念中的北部边塞,诸如蓟北、辽西、榆塞等一些地名已成为一种地理文化意象,常常和征人、思妇、鸿雁等意象联系在一起出现在中国古代诗歌中,然而真的在一个较短时期内,数位优秀诗人接连到达并供职于此地,这恐怕还是第一次。这种相对集中在当时文化发达区不值一提,在文学史上也不起眼,但对于被认为“胡化”最为严重的北边重镇幽州,则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另外,刘济镇幽州期间,利用地方经济有所恢复和社会安定的时机,重启安史之乱以来陷入停顿的房山刻经,应该说也是河北地区的一件文化盛事。

长庆元年(821)成德王廷凑杀节度使田弘正自代,结束了“元和中兴”的大好局面,河朔复叛。不过,此后河朔地区特别是中南部的成德、魏博两镇,社会文化逐渐走向汉化,出现了不少政治上倾向于中央、文化上“服膺儒术,招纳文人”的藩帅是其重要标志,从唐诗研究的角度看,最显著的信号是在唐末的成德、魏博,各自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带有文人集团性质的诗人群体。

元和年间田弘正罗致宾佐文士,重点犹在儒书和历史,“颇好儒书,尤能史氏,《左传》、《国史》,知其大略”。到了唐末罗绍威幕府中,幕府文人活动则不限于谈论经义,文学歌咏成为了重要内容,“每公私宴集,无不属和”<sup>[13]</sup>,而罗绍威本人也称得上是一位诗人:

威性明敏,达于吏道。伏膺儒术,招纳文人,聚书至万卷。每花朝月夕,与宾佐赋咏,甚有情致。钱塘人罗隐者,有当世诗名,自号“江东生”。威遣使略遗,叙其宗姓,推为叔父。隐亦集其诗寄之。威酷嗜其作,目己所为曰《偷江东集》,凡五卷,今邺中人士讽咏之。<sup>[5]4693</sup>

罗绍威与著名诗人罗隐的交往是晚唐诗史上的佳话,罗隐对来自这位同姓仰慕者的情谊也是欣然接受,“深荷吾宗有知己”,写有《魏博罗令公附卷有回》、《寄呈邺王罗令公五首》等多首相赠。另外从罗隐《邺城》、《燕昭王墓》等诗来看,他足迹曾至河北,因此与罗绍威并非止于神交,很可能曾为邺王的座上客。

罗绍威周围文士,尚有刘赞:

刘赞,魏州人也。幼有文性。父玘,为令录,诲以诗书,夏月令服青襦单衫。玘每肉食,别置蔬食以饭赞,谓之曰:“肉食,君之禄也。尔欲食肉,当苦心文艺,自可致之,吾禄不可分也。”由是赞及冠有文辞,年三十余登进士第,魏州节度使罗绍威署巡官。

刘赞后为后唐名臣,曾知制诰。今有诗存世。罗绍威僚佐还有司空颀(《全唐文》存其文)、孙鷲(公乘亿婿,“有词笔”)、孙邈(乾宁五年进士)等<sup>[14]206</sup>。公乘亿在罗绍威任节度之前已去世,但绍威在其父罗弘信时期任节度副使,二人亦当有所交往。

魏博幕府在罗绍威之前已招致了较为著名的诗人:

山甫,咸通中累举进士不第,落魄有不羁才。……为诗托讽,不得志,每狂歌痛饮,拔剑斫地,少撼郁郁之气耳。后流寓河、朔间,依乐彦棣为魏博从事,……山甫诗文激切,耿耿有齐气,多感时怀古之作。今集一卷、赋二卷,并传。<sup>[15]484</sup>

彦棣喜儒术,引公乘亿、李山甫皆在幕府。<sup>[4]5938</sup>

公乘亿咸通十二年与许棠、聂夷中同榜登进士第,曾先后为乐彦棣和罗弘信从事。诗及其他著述甚多,《北梦琐言》称其“赋诗三百首,人多书于屋壁”,《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公乘亿诗》一卷,《赋集》12卷,《宋史·艺文志》记其《珠林集》四卷,《华林集》三卷、集七卷,惜皆已佚。

成德末代藩帅王镒“为人仁而不武,未尝敢为兵先”,“承祖父百年之业……为唐累世藩臣。故镒年虽少,藉其世家以取重,四方诸镇废立承继,有请于唐者,皆因镒以闻”<sup>[16]411</sup>。已成为唐末藩镇中与唐朝最为密切者。而王镒至少在早年也和魏博罗绍威一样,身边罗致了许多文士。《太平广记》卷203引《耳目记》:

王生(王敬傲,唐翰林待诏)后又游常山,是时节帅王镒年在幼龄,初秉戎钺,方延多士,以广令名。时有李夔郎中、莫又玄秘书、萧珣员外、张道古并英儒才学之士,咸自四集于文华馆。

同卷又记载了一次文士间的诗会:

道古名睨,博学,善古文,读书万卷,而不好为诗。曾在张楚梦座上,时久旱,忽大雨,众宾皆喜而咏之。道古最后方成绝句曰:“亢阳今已久,喜雨自云倾。一点不斜去,极多时下成。”坐客重其文学之名,而哂其诗之拙也。

一场甘霖即引起“英儒才学之士”喜而咏之,足见风雅之会平时常有,张道古有文学之名而诗作不好遭到哂笑,亦可见更多的人是看重作诗的。张道古,“沧州蒲台县人,擢进士第,拜左补阙,文学甚富,介僻不群”<sup>[17]114</sup>。今存诗二首,其卒后,晚唐诗人贯休、郑遨皆有《悼张道古》诗。

另外,王镒“专求长生之要,常聚缙黄,合炼仙丹,或讲说佛经,亲受符篆”,与僧道过从密切,从他传世的《哭赵州和尚二首》知其与佛教史上著名的赵州从谏和尚有交往,且可谓礼敬有加。后者既是高僧,也是一位诗僧,《全唐诗补编·续拾》收其诗17首。

从以上材料看,罗绍威、王镒与他们的幕中文士已具有文人集团的性质,这些诗人作品多散佚,除了本身成就不高之外,与唐末五代北方的长期战乱,已非以诗传名、传写诗集的时代也不无关系,尽管如此,这种已初具文人集团性质的创作群体的形成,对考察中晚唐河北社会文化状况的实际以及演变,还是有着重要的标志意义,无论从社会史还是从文学史的角度,都值得研究者关注。

通过对有关河北的中晚唐诗作专题研读,笔者认为,不应因唐后期河北藩镇与中央政治上的分庭抗礼而无视文化的大体相通,“当日河北社会全是胡化”的观点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后人在沿用河朔胡化说,服膺大学者卓识的时候,似乎并不关注这一观点在陈寅恪先生的原作中,本来便是带着疑惑提出的“假说”,而非考证周详的论断:“夫河北之地,东汉、曹魏、西晋时固为文化甚高区域,虽经胡族之乱,然北魏至隋其地之汉化仍未见甚衰減之相,何以至玄宗文治灿烂之世,转变为一胡化地域?其故殊不易解。”对此,陈寅恪先生在分析了隋末至唐前期西域胡族的内徙情况后,“作一假说,以待将来之确证,然私心殊未敢自信也”。他提出“在李唐最盛之时即玄宗之世,东汉、魏晋、北朝文化最高之河朔地域,其胡化亦已开始”<sup>[3]44</sup>。然而在唐前期,不要说在中西交流的前线西北诸州郡,即便在国都长安,长住的胡族又岂在少数?若民族、文化之融合即可称为胡化,那么胡化的岂独河朔?本文认为,先生的“殊不易解”,正是因为他着重强调河北与唐中央之异,而遗其相同相通,因而主观夸大了“胡化”程度。胡族内徙之事固然值得注意,但此处也正如傅璇琮先生提出质疑的以胡族人居解释李

栖筠自赵徙卫一样<sup>①</sup>,是反而把事情搞复杂了。唐诗中所包含的丰富信息足以说明,唐前期的民族融合为河朔注入新鲜血液,藩镇割据使河北文化遭受重创,出现退步和一定程度的“胡化”是客观存在的,但唐后期河北社会文化的主体仍是处于退步、萧条期的汉文化,并且在与游牧民族文化的融合中逐渐实现着对游牧文化的同化。

### 参考文献:

- [1]王会昌. 中国文化地理[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 [2]梅新林. 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 上册[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 [3]陈寅恪.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 [4]欧阳修. 新唐书: 卷 131 第 14 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5]刘 昉. 旧唐书: 卷 39 第 5 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6]戴伟华. 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M]. 修订本.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 [7]戴伟华. 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8]陈尚君. 唐代诗人占籍考[C]//唐代文学丛考.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 [9]陈尚君. 全唐诗补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 [10]大唐故袁州宜春县尉院西李府君墓志铭并序[M]//千唐志斋藏志.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3.
- [11]徐礼节, 李书安. 张籍王建求学“鹤山漳水”地域考[J]. 巢湖学院学报, 2007(1): 89-92.
- [12]申 芬. 于鹤籍贯及生平事迹考[J]. 四川文理学院学报, 2010(1): 33-36.
- [13]王钦若. 册府元龟: 卷 716[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14]戴伟华. 唐代藩镇文职僚佐考[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 [15]傅璇琮. 唐才子传校笺: 卷 8[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 [16]欧阳修. 新五代史: 卷 39[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17]孙光宪. 北梦琐言: 卷五[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 On the Hebei Social and Cultural Conditions of the Period of Military Governorship from Tang Poems

Ma Jizhao, Li Guoliang

(Qinhuangda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Qinhuangdao 066100, China)

**Abstract:** By the Hebei poems in the middle and late Tang Dynasty, we can see the Hebei regional culture has been considerably retrogress and desolated, but it has absolutely not been totally assimilated by Hu ethnic groups. The main of Hebei culture in that time was still the Han culture, and further more, in the interchanging and merging each other, the original culture in Hebei region was gradually assimilating the invaded culture of the nomadic tribes.

**Key words:** Military governorship; Tang poems; the middle and late Tang Dynasty; social culture of Hebei; huization

(责任编辑 王 作)

<sup>①</sup>傅璇琮指出:“陈寅恪先生由李栖筠之自赵徙卫,而论及开元末河北之地诸胡族入居的情况,为前人之所未道,堪可注意。但开元末、天宝初河北胡人是否有如此大的势力,能将世居其地的山东士族逼走,乃至‘舍弃其祖莹旧宅并与莹兆有关之田户而他徙’,还不无可疑。李栖筠之迁徙,是否能概括当时河北山东士族的情况,似还缺少其他例证。唐人离家隐居山寺者极多,栖筠自登科后即仕宦于长安及其他地方,安史乱后河北又为战乱之地,因此未得还其旧居,也合于情理,似不必迂回曲折,以胡人入居河北来作解释。”参见傅璇琮《李德裕年谱》,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 页。